

孫中山與基督教的關係

譚啟見

（一）前言

孫文（1866–1925）——最為中國人所認識的名字可能是孫中山——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名垂不朽的大人物。他領導中國人推翻長久以來所建立的帝制，開創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有人稱之為「中國近代革命之父」，¹ 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學者尊之為「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國民黨及親中華民國的海外華人則尊之為「國父」，² 其著作《三民主義》更一度近乎家喻戶曉，非但被譽為「概括了整個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的動向，是當時中國最先進最完整的思想體系，並產生了國際影響」，³ 被視為中國意識形態革命的範本，更被寫進了國民黨黨歌歌詞，亦被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提出作為台灣海峽兩岸統一的基礎。到了 20 世紀末的 90 年代，

-
- 1 張緒心：〈序之二〉，《我的祖父孫中山》（孫穗芳著）（台北：禾馬文化，1995），頁 7。
 - 2 南懷瑾：〈序之一〉，《我的祖父孫中山》，頁 5。
 - 3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修訂本，李澤厚十年集第 3 卷，中（安徽：安徽文藝，1994），頁 304。

不僅海峽兩岸仍有研究人員專門研究孫中山，甚至海外華人流行的思潮中，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仍佔有一個席位。⁴

作為一個基督徒知識分子，孫中山不是那種抱持「達則匡時濟世，窮則獨善其身」的被動式、個人化信仰的人，而是滿有熱忱，一心要創造條件來實踐拯救他人，屬於主動出擊型的革命領袖。為了促成中國去舊迎新的突變，加速社會進化，孫中山採取了激烈的非常手段，不惜用武及流血犧牲，與基督教較多強調的和平福音不同。孫中山自言他進行革命是「從神道而入治道」，⁵ 而由中學及習醫時期起，他即循救

4 陳奎德：〈道術將為天下裂〉，《明報》，1996年7月31日，論壇版。陳奎德當時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他提到海外華人的思想與政治哲學相關者如下：其一是民主主義，當中有1.劃分政治地圖為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代表人物如方勵之、鄭義和辛瀨年等；2.民主社會主義，如劉賓雁等；3.憲政民主主義，如阮銘、蘇紹智、郭羅基等；以及4.基督教民主主義，認為在中國必須首先引進基督教，才有可能實現民主，如王策等。其二是自由主義，當中有1.自由主義憲政派，如林毓生、胡平、陳奎德等；2.經重新解釋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如李澤厚、劉再復等；3.新馬克思主義，如張旭東、劉康等。其三是主張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而走「第三條道路」，如鄒讜、甘陽、崔之元等。其四是與1989年前的新權威主義有淵源的新保守主義，如王紹光等。其五是三民主義，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既適應世界潮流，又合乎中國國情；中國的災難是由於背離三民主義所造成，重新評價及復興三民主義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支持者除海外僑界，也有學人如于大海等。其六是新儒家，如杜維明等。其七是反西方式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如王紹光及裴敏等。對今日的海外知識分子而言，基督教的聲音仍有一定分量。與一個世紀前維新派與革命派較分明的形勢，今日海外知識分子的選擇似乎更多，也較難統一而形成具體策略。

5 孫中山：〈致區鳳墀函〉，收《孫中山先生遺墨之一》（上海：真光雜誌社，1927）；轉引自孫中山：《孫中山全集》〔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1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1986），第1卷，頁46。

人靈魂的傳道，⁶到救人軀體的行醫，⁷以至走上救國救民的革命路途，在在反映出一種基督徒為他人而活的氣質。康德黎醫生（Dr. James Cantile）在悼念孫中山的輓詞中，就說到：「孫先生革命的抱負，及由此抱負所產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穌救世的精神。」⁸

孫中山博聞好學，聰慧過人，意志堅定，屢挫屢起，功成不居，而其博愛為懷的人格典範，不但在當時令不少人傾倒崇敬，更常被後世人傳頌。其中推崇孫中山者，不乏非基督徒，他們都不會因信仰的差異而吝嗇稱許之詞。本文是概略探討孫中山一生與基督教的關係。⁹林治平曾撰文〈國父孫中

6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台1版（台北：台灣商務，1969），頁14。其中喜嘉理牧師追記孫中山約二十一歲期間的事蹟說：「……乃躋資遣之歸國，學習傳道科，蓋彼時其傳道之志，固甚堅決也。向使當日香港或附近之地，設有完善之神學院，俾得入院授以相當之課程，更有人出資為之輔助，則孫中山先生者，殆必為當代著名之宣教師矣。以其熱忱親力，必能吸引多數人歸服基督；無如事不出此，蹉跎數月，而年齡加長矣。乃擬捨此而學醫，以為傳道而外，推行醫最為功於社會。」。馮自由原名馮懋龍，1894年成為興中會會員之一，曾肄業梁啟超為校長的東京牛遷區東五軒町高等大學校，梁啟超為支持其師長康有為對馮懋龍報上言論的責難，一度於梁氏著名報刊《飲冰室》倡議禁用自由及獨立等字眼，馮為表抗議，乃在1900年憤而改名馮自由。參《革命逸史》，第4集，頁103-5。馮自由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多年，對許多革命情節親見親聞，在南方及國外之國民黨黨務、報務與軍事活動都有經歷，後為民國稽勛局局長，專訪及查訂革命事跡，所著共五集《革命逸史》，為珍貴史料。

7 孫中山：〈東西藥局啟事〉，廣州《中西日報》，1894年2月27日；轉引自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1卷，頁1。

8 轉引自王治心：〈基督教與國民革命〉，收《中國基督教史綱》，4版（香港：基督教文藝，1993），頁264。康德黎曾幫助孫中山在1896年於倫敦脫離離開清使館，間接使孫中山得以在國內外確立為國際知名的中國革命領袖。

9 有關孫中山整個生平的年表，可參莊政：《國父生平與志業》（台北：中央日報出版部，1982），頁402-28。

山先生大學畢業前與基督教之關係〉，記述已頗精要，¹⁰ 故本文不會詳述早期孫中山與基督教的關係，僅精扼撮述後，便會討論孫中山成為革命及民國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後，他對基督教或宗教的看法。內容主要是耙梳整理孫中山本人的言行史料所得，而二手資料如後世人對他的評鑑，除非必要，否則盡量以非基督徒的說話來輔助。舉例而言，孫中山孫女孫穗芳是佛教徒，用不著為基督教說好話，而若她對孫中山的基督信仰平實道來，則其分量自比信徒言論來得持平、真實和客觀。

(二) 基督教有助孫中山從事革命

要追溯孫中山生平，著作繁多，¹¹ 若要扼要略述其早期事跡，最佳莫如引用其親筆自述。他曾於 1896 年三十歲時，函覆英國著名漢學家翟理斯 (H. A. Giles)，為助翟氏編纂《中國人民辭典》時寫此簡短自傳：

僕姓孫名文，字載之，號逸仙，籍隸廣東廣州府香山縣，生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華曆十月十六日。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十三歲隨母往夏威夷島 (Hawaiian Islands)，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是年母復回華，文遂留島依兄，入英監督所掌之書院 (Iolani College,

10 另外，李志剛一篇文章亦有很好的描述，參氏著：〈基督教徒對孫中山先生之認同新探〉，收《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二)》(台北：宇宙光，1993)，頁 169-91。

11 較近期並較詳盡兼努力考證者，有孫穗芳：《我的祖父孫中山》(台北：禾馬文化，1995)；張緒心、高理寧 (L. H. D. Gordon)：《孫中山：未完成的革命》(*All under Heaven . . . : Sun Yat-sen and His Revolutionary Thought*)，卜大中譯 (台北：時報文化，1993) 等。

Honolulu)肄業英文。三年後，再入美人所設之書院(Oahu College, Honolulu)肄業，此為島中最高之書院。初擬在此滿業，即往美國入大書院，肄習專門之學。後兄因其切慕耶穌之道，恐文進教為親督責，著令回華，是十八歲時也。抵家後，親亦無所督責，隨其所慕。居鄉數月，即往香港，再習英文，先入拔粹書室(Diocesan Home, Hongkong)。數月之後，轉入香港書院(Queen's College H. K.)。又數月，因家事離院，再往夏島(H. I.)。數月而回。自是停習英文，復治中國經史之學。二十一歲改習西醫，先入廣東省城美教士所設之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肄業。次年，轉入香港新創之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kong)。五年滿業，考拔前茅，時二十六歲矣。此從師游學之大略也。

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多博雜不純。于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于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Darw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瀏覽。至于教則崇耶穌，于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¹²

孫中山此期間與基督教的關係，除其所記外，最重要的可算是十六歲被兄長遣回翠亨村後，為破除迷信及偶像崇拜，曾聯同陸皓東折斷北帝神像一臂，用小刀割斷「金花夫人」手指，由此觸怒鄉人，以致要逃到香港避難及升學。在

12 孫中山：〈覆翟理斯函〔1896年11月〕〉，收《總理遺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藏，出版時間不詳）影印原函；轉引自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1卷，頁47-48。

香港於 1883 年冬天，孫中山與陸皓東於必列者士街綱紀慎會（又譯為美國公理會）正式在喜嘉理牧師（Rev. Dr. Charles R. Hager）主理下接受洗禮。又有一次他因信仰面臨重要抉擇，即其兄長孫眉在 1885 年勸說孫中山第二次到檀香山後，向孫中山表明，只有循規蹈矩，放棄洋教，他才會同意繼續履行贈予孫中山一半財產的諾言，孫中山卻毅然退回財產而不願改變他所認為正直的信仰。1886 年，孫中山離開檀香山回國習醫，亦在此段期間決意傾覆清廷，創建民國。¹³

在 1894 年興中會成立，成員宣誓時都把手放在聖經上，可見基督教對早期革命的影響。¹⁴ 事實上，孫中山習醫及行醫時，已先後結識基督徒志士，有區鳳墀、鄭士良、楊襄甫、陳少白、何啟、左斗山、王質甫等，而 1895 年廣州起義亦是得到基督徒志士的幫助。及是役失敗後，孫中山奔走海外各地，亦恆得教友之助，在日本橫濱，有張果、趙明、樂趙嶧、琴菅源傳等，美國有司徒南達、黃旭昇、毛文明、伍盤照、伍于衍、鄧幹隆、鄭華汰、黃勵泉等，新加坡有林文慶、黃康衢、鄭聘廷等，皆以基督徒之誼，先後對孫中山提供革命經費和所需協助。¹⁵ 1896 年孫中山在倫敦被囚於清使館時，他非但是靠賴其基督徒身分邀得基督徒洋役代為傳信求救，且得到康德黎及萬臣兩位基督徒老師之助脫險。孫中山的基督徒身分給予他最明顯的力量，是他仍被困時的祈禱經歷。他憶述道：

13 孫穗芳：《我的祖父孫中山》，頁 123-28。第一次廣州起義前，孫中山曾於 1894 年上書清朝直隸總督李鴻章，但未獲積極回應，而革命之心就更堅決了。〈上李鴻章書〉載於《萬國公報》月刊第 69、70 冊（1894）；轉引自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 1 卷，頁 8-18。

14 孫穗芳：《我的祖父孫中山》，頁 162。

15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 2 集，頁 12。

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¹⁶

自此之後，孫中山只能在國外奔走，鼓吹革命，募款及作境外籌謀工作，但其革命領袖之角色身分，已因此而更為海內外人士所知悉。

一些中國史書作者只輕描淡寫地提到革命的基督教性質，或甚至略而不提，但據學者研究所知：「晚清革命的肇始者，以及領導者，絕大多數是基督徒，而 1902–1903 年大明順天國革命後，革命潮流在國內非基督徒中風起雲湧，但基督徒在其中依然扮演活躍的角色。」¹⁷ 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多年的馮自由，對孫中山之基督信仰，則有這樣的說法：

考總理之信教，完全出於基督救世之宗旨，然其所信奉之教義，為進步的及革新的，與世俗之墨守舊章思想陳腐者迥然不同。余在日本及美洲與總理相處多年，見其除假座基督教堂演講革命外，足跡從未履禮拜堂一步。間有中西教士與之討論宗教問題，則總理議論風生，恆列舉新舊宗派歷史及經典，詳徵博引，透闢異常，殊非常人所及矣。又總

16 孫中山：〈致區鳳墀函〔1896年11月〕〉，收《孫中山遺墨之一》（上海：真光雜誌社，1927）；轉引自孫中山：《孫中山集外集》，陳旭麓、郝盛潮主編（上海：上海人民，1990），第1卷，頁45。

17 梁壽華：〈基督徒與中國革命的起源〉（神學碩士論文，中國神學研究院，1994），頁9。其實整份論文都是闡述基督徒在中國革命起源時的重要角色。

理自倡導革命以來，所設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等團體，其誓約均冠以當天發誓字樣，是亦一種宗教宣誓的儀式，蓋從基督教受洗之禮脫胎而來也。¹⁸

孫中山孫女孫穗芳評論馮自由的論述時，認為馮氏非常正確，孫中山「正是藉助基督教『平等』、『博愛』的精神，作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把教堂當成了宣傳反封建的革命講壇」。她也確認孫中山「建立起革命組織，也是受到基督教會組織方式的啟發，而他初期的革命活動，也曾獲得基督教徒無私的幫助」。她更反駁北京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的《孫中山傳》中，認為「他受基督教義宣傳的平等博愛之類的虛偽宣傳所欺騙，逐漸地熱中於聖經學習和參與宗教活動，並想受洗禮入教」之斷語，表示上述結論對孫中山「皈依基督教的真正精神境界和意義的實質，沒有達到深刻的認識……」。¹⁹ 為達到推翻帝制，振興中華民族，她認為孫中山吸收一切可以提供幫助的思想、文化及宗教都是合宜的，不應存在宗教事屬虛偽性的膚淺論斷。作為熱心的佛教徒，孫穗芳對孫中山與基督教之關係的正面看法，更見中肯而難以推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孫中山政治人格的解析者，在瞭解過孫中山曾參加的三類教會，即聖公會、綱紀慎會（或譯公理會）及英國倫敦會當時的神學教義，及其在華所作的工作，認為他們教會的神學思想是介於社會福音派及自由派之間：

社會福音派主要強調救時弊，其主要思想是將基督

18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 2 集，頁 12。

19 孫穗芳：《我的祖父孫中山》，上冊，頁 111-12。

人道精神應用於社會，透過關懷社會及民生疾苦的改革運動來傳播福音；而自由派則著眼於整個社會和國家的得救，其目標是促進中國社會的西化……而重視教會對社會菁英、知識份子的影響。²⁰

（三）孫中山稱許基督教對反清革命的貢獻

國外流亡 15 年後，孫中山於 1911 年 12 月 25 日第一次公開回到上海，其時辛亥武昌起義已大致成功，十多個省響應而宣佈脫離滿清政府，而奉清朝命令討伐革命軍的袁世凱覬覦共和國總統之位，願支持共和。自此至離世的約十五年間，孫中山在混亂的民國尋找民主，由做臨時大總統，到退位從事全國鐵路建設計劃，組國民黨，討伐袁世凱的濫權以至帝制復辟，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到討逆而召開非常國會、成立護法政府及發動護法戰爭，著述以做為意識形態革命之根據，及後在華南擬整固北伐卻因陳炯明叛變而受挫，繼而又在軍閥割據期間重整中國國民黨，奠定南方基地而以大元帥名義統領黨政軍，確立組軍北伐，推動以俄為師之策等等。孫中山末後的十多年，所歷之驚濤駭浪，可說比反清革命時期，在海外宣傳、募捐、策劃時更為凶險。與此同時，這亦是他在國內四處演講，傳遞救國意識及三民主義等觀念之時期。日理萬機的孫中山，除到基督教會歡迎會演講外，絕少踏足禮拜堂，而其所定宗教政策，及在亂局中對基督教的期許，因本人婚姻決定引起的小波瀾，及至離世喪事所採儀式等，都反映了孫中山這些年間與基督教關係的一麟半爪。

孫中山此時的自我定位是「治道」中人，對基督教採取「政教分離」之原則理解。自從事革命後，雖為基督徒，但他

20 華中興：《中山先生政治人格的解析》（台北：正中，1992），頁 57。

不單很少到教會崇拜，其表現信仰的形式與傳統基督徒形象也可謂分別殊大。

辛亥革命成功不足半年，孫中山在 1912 年 4 月 17 日於上海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上演說，謂：「今日吾中國尚在痛苦之中，如欲脫離此痛苦而建立一完全強大之中國，其至重要之責任，只在吾具有完全人格之全體青年。」²¹ 此亦可算孫中山對中國基督教會可如何為救國貢獻力量的基調，而基督教青年會的「人格救國」²² 對他而言，亦多有共鳴，認為是受救國黨人所歡迎的。

同年同月 21 日，孫中山在福州耶穌教會歡迎會上演說時稱：

此次革命，雖與宗教無甚關係，然外人來華傳教，殊能增進道德觀念，使吾人盡具純淨之愛國心。此後同胞盡力造成良善政府，則民教相安，中外感情愈厚，世界或即基此永保和平。且今日民國建設伊始，尤賴諸同胞注意道德，而後邦基可固。²³

約五個月後的 9 月 5 日，孫中山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會歡迎會中，更直言推許教會在革命上之功勞。他說：「兄弟數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號，始終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

21 孫中山：〈孫中山先生參觀上海中國青年會攝影附演說詞〉，《進步》雜誌，第 2 卷，第 1 號（總第 7 冊），1912 年 5 月；轉引自孫中山：〈上海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上的演說〉，收《孫中山集外集》，頁 53-54。

22 有關詳情，可參李志剛：〈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提倡「人格救國」及其反響〉，收《〈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1994），頁 495-508。

23 孫中山：〈孫前總統蒞閩記〉，上海《民立報》，1912 年 4 月 27 日；轉引自孫中山：〈在福州耶穌教會歡迎會上的演說〉，收《孫中山集外集》，頁 55。

者，大半由教會所得來。今日中華民國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會之功。」他並重申「希望大眾以宗教上之道德，補政治之所不及」。²⁴

1913年2月上旬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典禮致詞時，孫中山鼓勵在基督教大學讀書的青年：

《聖經》告訴我們，你們的光要照亮別人，使大家能知道應走的路。學問亦然，自己得了教育，也要設法去傳授別人。共和政體，以教育為根基。如今有千萬人民，需要你們去教育他們。這是你們的責任。你們要把你們所受的傳授別人，這樣你們的光就能普照人間。²⁵

這可說是孫中山強調信仰的社會效能，在於教化民眾，支持共和。

另外，孫中山亦分別於1919年10月8日向上海青年會²⁶及1923年10月12日對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²⁷，其主旨仍是呼籲與會者以救國為取向，移去武人（指軍閥）、官僚及政客等三種陳土，繼續以改造中國人的道德人格來救國，而很少提

24 孫中山：〈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會歡迎會的演說〉，上海《民立報》，1912年9月13日；轉引自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2卷，頁446-47。

25 孫中山：〈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典禮致詞〉，收《孫總理與基督教》〔謝頌羔編〕；轉引自孫中山：〈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典禮致詞〉，收《孫中山集外集》，頁76。

26 孫中山：〈孫中山先生「改造中國第一步」演說〉，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10月9日；轉引自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5卷，頁124-26。

27 孫中山：〈國民要以人格救國〉，收《總理全集》〔胡漢民編〕，第2集；轉引自孫中山：〈國民要以人格救國〉，收《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問題》〔邵玉銘編〕（台北：正中，1980），頁441。

到基督教信仰。

民國成立後，孫中山所寫而有關教會的信函極少，罕有的一次是 1919 年 6 月 30 日批閱浙滬慈善教會各公團函時，曾請祕書「一作函勗勉，並著積極鼓吹輿論，一致主張，以破反對和平者之陰謀也」。²⁸ 換句話說，目的不外是希望教會為其政治綱領及策略效力，視教會的表態或查問為眾國民之一而已，一如他勉勵其他軍、政、黨、商、外國友人和學生支持其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及建國方略。

事實上，孫中山一系列向基督徒的演講和與基督教團體的書信往來，都是重申基督教會對革命的貢獻，並著重呼籲基督教在道德人格培育上應承擔的任務，並且希望教會教育基督徒關懷救國大業，故此一如向其他人演講一般，重點是宣傳三民主義，號召教會中人為民族、民權、民生，以及五權憲法等提供推廣和培育的協助，在他發動第二、第三及第四次革命，為維護共和國體而戰時，做其輿論和教育助力。

在實際行動上，這時期的基督教傳教活動，越來越多側重以「社會福音」對應中國問題，²⁹ 如參與修築公路，在鄉間賑濟饑荒，推動醫療上的研究教育，資助社會科學的發展，贊助農業研究，推行平民教育運動等，都可以說是配合了孫中山所期許的救國回應。

(四) 孫中山主張政治上的信教自由政策

身為基督徒的孫中山思想開明開放，毫不狹隘。他在民主方面的觀念是接受西方政教分離的原則。他認為若中國人民在平等的基礎上都有信仰自由，政府與民間不會有無故的

28 孫中山：〈批旅滬慈善教會各公團函〉，收《國父全集》，第 4 冊；轉引自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 5 卷，頁 78。

29 J. K. Fairbank：《中國新史／費正清論中國》（*China: A New History*），薛絢譯，第 5 次印刷（台北：正中，1995），頁 293-94。

衝突。³⁰ 早在草擬民國約法時，孫中山已定下信仰自由的政策，而沒有將基督教奉為國教的想法，與興中會開始時要求成員按手在聖經上宣誓入會的做法已然不同，不強調所有中華民國國民要有同一的宗教信仰。當然，反清革命後期及民國初年，革命團體已不再是以基督徒為主導力量了。不過反過來說，當有人企圖鼓吹將孔教定為國教時，基督徒發起的簽名請願，也使國會維持了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³¹

有關孫中山與宗教自由的直接言論，早在 1912 年 3 月回覆佛教人士的公函中，孫中山已重申民國約法第二條第七項「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及政教分離的原則。³²

1912 年 5 月 9 日，孫中山在廣州耶穌教聯合會歡迎會上，則說道：

我兄弟姊妹，對於教會則為信徒，對於國家，則為國民。專制國之政治在於上，共和國之政治在於民……且前清之對於教會，不能自由信仰，自立傳教，只藉條約之保護而已。今則完全獨立，自由信仰。為基督徒者，正宜發揚基督之教理，同負國家之責任，使政治、宗教，同達完美之目的。³³

1912 年 9 月 15 日在北京回教俱進會歡迎會上的演說中，孫中山強調「五族人民平等，五族宗教亦平等」，有效團結了少數民族和伊斯蘭教的穆斯林，而在提到一些伊斯蘭國家之

30 張緒心等：《孫中山未完成的革命》，頁 88。

31 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1988），頁 124。

32 孫中山：〈覆佛教公函〉，收《孫中山集外集》，頁 365。

33 孫中山：〈在廣州耶穌教聯合會歡迎會的演說〉，上海《民立報》，1912 年 5 月 16 日；轉引自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 2 卷，頁 360-61。

覆亡時，他說：「然而該國之亡，非信宗教之咎，乃政治不良之故也。故雖有極好之宗教，而無所附麗。」³⁴

對別的宗教信徒而言，這種胸襟和尊重，的確惹人好感，能團結更多人支持其政治主張，以致各個宗教都可在救國和建立共和政體此目標上同心同德，不必因宗教而黨同伐異。

(五) 孫中山重婚令他疏遠了基督教會

孫中山較難獲基督教會認同之行為，可以說是與年輕三十年的宋慶齡結婚。孫中山作為一個基督徒，這行為就是犯了重婚罪。原為孫中山英文祕書的宋慶齡不理家庭反對，毅然走到日本東京，與有婦之夫孫中山結婚。他倆曾在 1915 年 10 月 25 日簽訂誓約，表示將會：

1. 盡速辦理符合中國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續；
2. 將來永遠保持夫婦關係，共同努力增進相互間之幸福；
3. 萬一發生違反本誓約之行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會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異議；而且為了保持各自之名聲，即使任何一方之親屬採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³⁵

換句話說，他們亦知道他們的結合可能會受到法律、社會及家屬之制裁。

事實上，宋慶齡之父宋躍如牧師對他最好的朋友和他女兒的重婚式結合，感到是他一生最傷心的事，而他也因此

34 孫中山：〈回教俱進會歡迎孫中山〉，《申報》，1912年9月22日；轉引自孫中山：〈在北京回教俱進會歡迎會上的演說〉，收《孫中山集外集》，頁65。

35 〈與宋慶齡婚姻誓約書〉，原件為日文，李錫經、馬秀銀翻譯，見《孫中山全集》，第3卷，頁199。

與宋慶齡脫離父女關係，並斷絕了共同為革命奮鬥了二十年的好友友誼。事件亦令來自宋躍如一向代募的美國民間，特別是教會朋友所得的革命捐款大減，致使孫中山更需依靠日本籌募作戰經費。而對宋媽媽這樣一位樸實、坦率、篤信宗教教義的婦女來說，宋慶齡的私奔尤其是一個猛烈的打擊。孫中山在日本結婚時並沒有如他對宋慶齡及所有人所說般已與元配離婚，孫中山元配盧慕貞及其子女雖感錯愕及難以相信，但後來似乎是接受了。³⁶ 盧慕貞後來雖表示同意離婚，而孫中山日後仍有負責任的表現，與之有書信往來以表示關心，甚至還曾與宋慶齡一起探望她，並似乎獲得後輩如兒子孫科及孫女孫穗芳的體諒，³⁷ 但對於外國基督教會而言，這行動已令人對孫中山的支持進一步打了折扣，加上當時他為求日本的財政援助而承諾給予日本特權，以致不少革命朋友都非議孫中山的行事為人。³⁸

研究孫中山的學者張緒心和高理寧（Leonard H. D. Gordon）就孫中山重婚對他與西方基督教會之關係的影響，有這樣的一段話：

他頑強堅持貫徹革命的意志，一定是來自一種藏於內心的思想力量，再加以對基督的信仰。雖然孫中山的基督教意識和實踐似乎並不像學生時代那樣強烈，但他仍繼續堅持他的基督徒原則。然而，由於他沒有與前妻合法離婚便娶宋慶齡，造成西方基督教會對他的責難，使他頗為沮喪，因此他遂與在華

36 Sterling Seagrave：《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譯者不詳，全譯本 10 版（澳門：星光書店，1994），頁 133-36。

37 孫穗芳：《我的祖父孫中山》，下冊，頁 63-65。

38 張緒心等：《孫中山未完成的革命》，頁 119；孫穗芳：《我的祖父孫中山》，下冊，頁 65。

的教會疏遠。一位學者（指Wang Chi-chen）指出，由於這次的怨恨，使他「把教會的事業與外國在華的剝削行為聯結起來」；其實十九世紀許多的中國人都有此共同想法。³⁹

（六）孫中山的自由派宗教觀

縱或政事繁忙，孫中山仍如昔日流亡國外般，抓緊機會讀書，不論是政治、外交、法律、軍事、礦產、農業、工程、經濟、格致/科學、地理及宗教知識等，都有涉及。⁴⁰他在1918年7月26日給兒子孫科的信函中，更提到他近日讀過孫科給他的書：「汝日前與我之《宗教破產》一書，殊為可觀。父自讀 Dr. White's *War of Science and Theology* 之後，此書算為超絕矣；其學問比 White 氏有過之無不及。」⁴¹從中可見孫中山選讀的宗教書籍相當開放，也受19世紀及20世紀初自由主義的思潮影響。自由派神學亦稱為現代主義，為19世紀下半葉神學思想上的轉變，主要特性是希望用現代的文化與思想模式來形成宗教觀念，強調理性、科學，意味著信仰界與自然律、啟示與科學、神聖與世俗，或宗教與文化之間，並無固有衝突。故此，自由派對科學的發現表示歡迎，並且容納達爾文主義的挑戰。⁴²

39 張緒心等：《孫中山未完成的革命》，頁263。

40 孫穗芳：《我的祖父孫中山》，上冊，頁196。

41 孫中山：〈致孫科函〔1918年7月26日〕〉，據許師慎：〈《國父全集》未刊之重要史料〉，收《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與史學》，黃季陸等著；轉引自孫中山：〈致孫科函〉，收《孫中山全集》，第4卷，頁489。書中編輯在按語中，懷疑《宗教破產》為尼采所著的《上帝之死》，而英文書則是美國教育家及政治家 Andrew Dickson White (1832–1918) 所著 *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 之縮寫。

42 趙中輝編著：《英漢神學名詞辭典》（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90），頁423–28，「自由派神學」條。

孫中山雖然信奉基督教，但他解釋自然時，是完全依據科學的，特別是他自青年時期已喜好的西學「達文之道」。⁴³ 在1923年10月12日對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的講詞中，孫中山除重申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以體育、智育、德育的人格救國的主張，使年青人成為國家友好黨人，鼓勵青年會務須切實執行此政策外，更罕有地談到宗教和科學的比較。他主要是對比基督教創造論和進化論，其原講詞有以下論述：

科學的知識，不服從迷信，對於一件事，須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過細去研究，研究屢次不錯，始認定為知識。宗教的感覺，專是服從古人的經傳。古人所說的話，不管他是對不對，總是服從，所以說是迷信……這就是宗教不及科學。因為這樣的原故，現在宗教知道專迷信古人經傳之不方便的地方很多，便有主張更改新舊約的，推廣約中的文字範圍，以補古人所說之不足。至於宗教的優點，是講到人同神的關係或同天的關係，古人所謂天人一體。依進化的道理推測起來，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既成人形，當從人形更進化而入於神聖。是故欲造成人格，必當消滅獸性，發生神性，那麼才算人類進步到了極點。⁴⁴

依此可見，孫中山不僅是容納進化論的基督徒，他對進化論的信仰更似乎尚在基督教信仰之上。

43 孫穗芳：《我的祖父孫中山》，下冊，頁132。

44 孫中山：〈國民要以人格救國〉，頁441。

(七) 共產主義宣傳和非基督教運動影響下的孫中山宗教觀

孫中山在世最後的幾年，令人詫異之舉是主張以俄為師，參考其成功因素以幫助救國。其中一例或可反映孫中山對聯俄聯共，以至對共產主義的欣賞與憧憬。1924年2月16日孫中山對馮自由的聲言，即提到：「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應當革除黨籍及槍斃。」⁴⁵換言之，他在思想上曾認為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很接近。

然而，另一些時候，他未能同意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觀念，更於1923年1月和蘇俄代表聯合發表聲明，表示因為環境不適宜而不贊成中國實行共產主義。他也從來沒有像蘇俄和共產黨人所期望的那樣，使用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來替代民生主義做論述的用語。有外國學者就曾指出，因為孫中山「對『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曖昧態度……我們將永不可能知道孫中山對共產主義的態度」。⁴⁶

孫中山晚年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反覆游移，不過已使他於1924年間的三民主義演說中，開始抨擊帝國主義，顯示共產黨的觀念可能已經影響他對中西關係的態度，⁴⁷並使他對基督教之評價有相當大的矛盾，甚至與其一貫以正面眼光看基督

45 孫中山：〈馮自由致孫中山函稿〉，《檔案與歷史》，1986年第1期。同題異文見於《孫中山與共產黨》（1924年版）：「姑念汝等效忠本黨已久，對本總理尚能服從；否則，定將汝等打靶。此案交中央執行委員會裁判，裁判結果，最低限度亦須將汝等革除黨籍。」轉引自孫中山：〈對馮自由的聲言〉，收《孫中山集外集》，頁309-10。

46 Michael R. Godle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n Yat-s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8 (July 1987): 119-20. 轉引自張緒心等：《孫中山未完成的革命》，頁236。

47 林榮洪：《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香港，天道，1980），頁181。

教會對中國革命的貢獻的看法不一樣。

1924年，他在向中國基督教青年演講時，仍盛讚「教會之入中國，既開闢中國之風氣，啟發人民之感覺，使人卒能脫異族專制之羈，如摩西之解放以色列人於埃及（即埃及）者然」，⁴⁸但同年他所發表的《「九七」國恥紀念宣言》中，則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在回顧庚子八國聯軍及辛丑和約等喪權辱國的歷史，分析列強的侵略時，將「宗教侵略」與「政治上武力上的侵略」和「經濟上財政上的侵略」相提並論，皆看為外國帝國主義侵略。當時所用措詞如下：

除了以上兩般之外，還有宗教的侵略。他們用政治力、經濟力來耗奪中國人的物質還不算，又用宗教來耗奪中國人的精神。一般神甫、牧師，倚仗著他們的國力，包庇教民，干預詞訟，欺壓吃教以外的人，無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⁴⁹

同一年內，孫中山對宗教的評價分別之大，可謂令人咋舌。

這種分析，與孫中山逝世前在中國出現的非基督教運動之言論有相似處，⁵⁰甚至好像當時的共產黨領袖對基督教之理

48 孫中山：〈新中國基督教青年〉；轉引自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11卷，頁537。

49 孫中山：〈「九七」國恥紀念宣言〉；轉引自孫中山：《孫中山集外集》，頁532。

50 參江紹原：〈給孫科先生的信同他討論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北京《晨報》，1925年3月12日；張宙：〈讀「國民黨與基督教」後致孫科先生〉，北京《京報》，1925年3月16日。兩篇文章均反駁孫中山之子孫科署名的〈國民黨與基督教〉一文（載北京《京報》1925年3月16日）。之後燕京大學的簡又文亦撰文〈同江張二君討論孫科君的文章〉，詳細澄清外界以基督教為帝國主義先鋒的誤解。此文載《生命月刊》（北平），第6卷，第4期（1926年1月）：1-14。

解，或許也可說是中國共產黨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統一戰線策略的宣傳成功。例如年青的周恩來當時就曾撰文如此評斷，說：

基督教源自平民反猶太教的鬥爭，但教會很快便淪為統治階級控制和壓抑群眾的工具……當基督教在十九世紀開始在西方沒落時，教會便轉投帝國主義者，希望藉游說亞洲、非洲人民接納西方基督教文明，以期邁向現代世界來重建基督教的影響力，但基督教和帝國主義都是注定會因國家解放的紀元來臨而日落窮途的。⁵¹

這或許可說是草創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反帝國主義統一戰線的成功，使國民黨黨魁孫中山也應用其分析，並且甘冒其他國民黨黨員反對之險，主張接受俄國的協助，並且容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八) 孫中山喪葬採納了基督教儀式為元素

帶著對基督教的矛盾評價，孫中山在不足六十歲之年，就因肝癌一病不起。

據孫中山元配盧慕貞憶述，孫中山臨終前一日，曾向兒子孫科「自證：『我本基督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要如是奮鬥，更當信上帝。』」她說此乃孫科手書所言，並且十分多謝天父，聽其所求而復賜孫中山信上帝之心。⁵² 憑此片

51 周恩來：〈基督教與帝國主義〉，《反基督教週刊》，1925年2月25日；轉引自 Jessie G. 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 —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of 1920–1928* (Notre Dame: Cross Cultural, 1988), 132–33。此中文本是由英文譯本回譯而得。

52 張亦鏡編：〈盧夫人答香山商會函中之——孫中山先生歷史〉，收《孫

段，可知她曾以為孫中山失落了信上帝之心，而孫中山的自證，也撥開了他已從信仰中流失的迷霧。

孫中山臨終的時候，私人財產極少，《家事遺囑》中自言：「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成長，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表明孫中山兩袖清風的革命風骨，有一種捨己為國，毫無為己積蓄私有財產的精神。而孫中山又曾把夫人託付於革命同志說：「她是個基督徒，你們不要因她是個基督徒就歧視她。」⁵³可見孫中山臨終時，不僅他本人、他的元配盧慕貞，以至年輕夫人宋慶齡，當時俱仍為基督徒。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肝癌病逝北京。眾人在商議其葬殮儀式時，曾有極大爭議。有認為孫中山既為基督徒，應按基督教儀式成殮；亦有認為他是革命領袖，不應受某一宗教利用。最後是由汪精衛調解，對孫中山的宗教信仰表示尊重，先於3月19日在協和醫院大禮堂舉行祈禱會，然後將靈柩昇至中央公園社稷大殿靈堂安放，舉行國葬典禮。⁵⁴

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姐夫孔祥熙在追思祈禱會中向參加者發悼詞，謂孫中山臨終前曾對他說：「就像上帝把耶穌送到世界上一樣，上帝也把我送到了世界上。」⁵⁵而前司法部長徐崇智所致悼詞，也摻雜了一些孫中山自己講的關於他同耶穌相似的話：

中山自歷明證》（上海：美華浸會印書館，1931），頁78；轉引自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化論文集》，4版（台北：台灣商務，1975），頁109。

53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化論文集》，頁126。

54 李志剛：〈基督教徒對孫中山先生之認同新探〉，頁174-75。

55 轉引自Seagrave：《宋家王朝》，頁193。

他是一個革命者；我也是。……他是來拯救窮人、不幸者和被奴役者的。我也想像他這樣做。……他公開譴責猶太的立法者所保持的傳統，宣傳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主張。正因為有同樣的桎梏束縛著中國，所以我才發動我的十字軍運動。正因為有組織的教會是那麼離心離德，我早就退出教會，但是我相信耶穌和他的教義，並努力使之成為我自己的教義。⁵⁶

靈柩運送路途上，沿途有約十二萬民眾送靈致哀。在3月24日中央公園發喪致祭，幾十萬北京市民前來祭奠。4月2日，孫中山的靈柩送往北京香山碧雲寺安放，又有三十萬人送殯，可算極盡哀榮。⁵⁷數年後，孫中山的遺體最後按他本人死前心願，葬於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九) 一點反省

晚清革命中，基督教的因素是肯定的。梁壽華視基督教為中國革命的酵母，醞釀了革命的產生，但這場革命算不上「基督教革命」或「教會革命」，而只可視為「基督徒運動」。孫中山可說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他是一個接受了基督教的中國人。基督教的影響並不是他唯一的革命原因，而是他的基督教培育與他所面對的、所處身的中國衰敗實況碰撞，由此令他產生革命意識與行動。他的革命或有實現「基督教價值」的成分，如一些評論者常說的博愛、自由、平等，但其最重要的動機乃是救國，希望藉政制及政治的突變，使中國不再困限在喪權辱國、積弱不振、任由外國欺凌的泥沼，而不

56 同上。引文想必是由悼詞譯成英文，再輾轉譯回中文。由於未能找到原始資料，只得暫用此二手譯文。

57 孫穗芳：《我的祖父孫中山》，下冊，頁203-4。

是為教會去實現「基督教使命」。⁵⁸ 在孫中山的從政生涯中，大致是主張政教分離，⁵⁹ 其基督徒身分雖非執意隱藏，但亦沒有標榜，這也使他能團結更多具其他宗教信仰，包括堅持中國道統的儒家讀書人的支持，⁶⁰ 成為國人景仰的對象。

說基督教徒認同孫中山，大抵是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就如王治心所寫的《孫文主義與耶穌主義》，就幾十年來承傳下來，而章力生撰《孫文主義的神學基礎》則強調要把孫文主義納入神學上的探究，方有清晰的瞭解等，已是較能退一步反思孫文主義是否真正具有神學意義的價值。李志剛更搜集了好些資料以反映基督徒對孫中山的認同。

李志剛在評論時，曾點出：

基督教徒之彼此認同，最終目的是要見證耶穌基督，傳揚福音，而孫中山有見及此，故主張政教分離。為免被宗教利用，有誤革命事業，或是因革命事業而連累教會，是以在民國成立後，孫中山經已絕跡教堂禮拜，而他所強調的，信奉基督不在於形式，而在精神，舉凡束縛之禮制教義，不表贊同。此外，他認為各國教會，與基督精神相去甚遠，致

58 梁壽華：〈基督徒與中國革命的起源〉，頁7。

59 孫中山：〈覆美以美會高翼聖、韋亞傑論中國自立耶教會函〉，收《國父全書》（台灣：國防研究院，1963），頁441。

60 蔣復璁（1898–1990）可被視為一例。蔣復璁歷任中央圖書館館長、台灣大學教授、故宮博物院院長等職，撰下文時已近七十歲，可說代表了好些儒家思想者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想法。他寫道：「國父的思想與一切設施都是用吾國道統相傳的心法——中庸之道，把中西文化融會貫通，作成一個福國利民的方案——三民主義。這個方案是完整的，不是枝枝節節的，其基本思想是根據儒家自孔子起都以仁為最高的理想，脫胎於大學及禮運的大同章，求仁實現的理想國。」見蔣復璁：〈國父繼承中華民族道統的淵源〉，《台灣新生報》，1967年7月30日；轉引自《中山思想要義》（台北：台灣書店，1994），頁233。

令他對教會卻步。孫中山與傳統教徒信仰固有出入，惟其追求信仰之完美則可理解，因此有謂孫中山先生的宗教經驗，乃屬本色化的表現。然而，孫中山先生盡以教徒本份貢獻於中國，締造共和，解救中國人民脫離專制，及至臨終之前仍能堅信基督，此亦足為基督教徒所認同和欽敬的。⁶¹

按上面所引悼詞推斷，依孫中山對教會、對耶穌及耶穌所傳教義的角度看，加上他一貫只傳救國建國，以宣傳、著述以及建軍作戰來推動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構想，及幾十年來的政治行為來說，孫中山會否如李志剛所說的，是因為怕連累教會而實行政教分離，實在值得懷疑。那似乎不是孫中山的思考進路。從孫中山歷來的所言所著來看，救國是主調，反清、倡共和及富強中國才是他最關注之所在，而在此遠象之下，基督教會既未能起到關鍵性的政治作用，他自然不必提政教合一。若要政教合一，他所考慮的或會是中國的道統，即孫中山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的精神。筆者同意林榮洪的觀點，認為很難在孫中山的政治著作中找到直接的基督教材料，而任何主張孫中山的思想曾受基督教薰陶的過分言論，均難以獲取足夠的證據。⁶²

無可否認，在孫中山的青少年時期，教會及其基督教信仰給他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具體影響大抵可跟隨華中興所說，是給了孫中山：1. 清教徒式的嚴謹生活；2. 良好的人際關係；3. 道德理想人格的取向；4. 國家民族的意識；5. 提供了學習民主和關心政治的機會；6. 培養了積極參與社會改革

61 李志剛：〈基督教徒對孫中山先生之認同新探〉，頁186。其中認為孫中山的宗教經驗屬本色化的表現之論點，出自招觀海：〈孫中山先生之宗教經驗〉，《真光》，第24卷，第11至12合號，頁40-41。

62 林榮洪：《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頁216。

以至從事革命的精神；和 7. 習得宣傳說服的技巧。⁶³

然而，在從事革命工作後，基督教除了供應了響應最初革命號召的一部分革命同志外，基督教——尤其是教會——對孫中山的影響並不顯著。換個角度來說，教會團體、基督教學校、教會機構等不過是革命宣傳的工具或場地而已，其作用只在於成為他的政治主張的推廣助力。成為大人物之後，基督教教會已是他心目中離心離德的團體，不能恆常附和他的政治綱領。特別是帝國主義與軍閥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教會與列強干預中國難以完全抹煞的關連，都令這位特立獨行的革命家，在世的最後一年，居然一反五十多年來正面評價教會對革命的貢獻的基本看法，把基督教的傳入說成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成分，當然更不能如年青時般，為宗教傳道大發熱心，甚至興起唸神學當傳道人之念。大抵這也可說是他恨教會鐵不成鋼，未能大力支持他的政治綱領。

總的來說，正如徐崇智在悼詞中所言，孫中山始終一生自覺是信奉耶穌和祂的教義，並且透過其一生的革命行動，以表達他所認識的耶穌教義的。雖然偶有迷惑反覆的時候，但歷盡波劫、困難苦幹地從事革命三十多年後，到彌留的最後階段，仍堅持信仰，不負妻兒所望，也可見其信仰之心。從事革命和在政治亂局中堅持三民主義信念，早已佔據了孫中山絕大部分的精力，要他同時反省政治神學或政教分離的神學基礎，自是局外人的一廂情願。

63 華中興：《中山先生政治人格的解析》，頁 59-63。另外，在頁 316 中，華中興更以表格形式，分析孫中山政治人格結構功能與政治社會化機構之關係，也有一定參考價值，詳情請看附錄。